唐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

韩瑜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唐小说发展的步伐, 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 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 具有时代进步色彩; 唐代精怪信仰故事延续魏晋以来精怪故事模式, 因富有谐趣精神在唐小说中自成门类, 并成为精怪小说的一种传统模式加以延续。神灵信仰作为权力的代表在唐小说中呈现出新的变化, 一是神灵的权力在世俗信仰世界的不断下降, 一是人性化色彩逐渐加深, 而后者正是唐小说最根本的风格和特色所在。

关键词: 唐代小说; “鬼故事”; 精怪小说; 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6-0092-05

在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无论从内容涵容、风格特点还是主题选择方面都少不了民间信仰元素的介入。民间信仰和小说在精神诉求、想象特点和表现形式上常常不谋而合, 并因此形成了中国小说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这在唐小说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按照民间信仰的大致分类, 可将唐代民间信仰主要分成神灵信仰、鬼魂信仰和精怪信仰三大类。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在小说中主“情”, 神灵在唐小说中则主“权”, 而民间信仰中的精怪则因着怪异、促狭等特点, 成为唐小说中幽默戏谑、插科打诨的主角。

一、鬼魂信仰和唐小说中的“情”

从志怪小说产生的那天起, 描写鬼世界的作品在数量和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了写神写怪的作品, 正是在这一点上, 中西文学表现出了极大差异。西方文学史上没有志怪小说的提法, 鬼故事更是凤毛麟角, 这种差异源于文学故事中所反映的深层信仰差异。以基督教为例, 基督教信仰中的神至高无上、超越世俗, 人死后只能经由神的审判, 或升入天堂或堕入地域, 不存在一个能够介入人间的游离者——即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鬼魂。相比较下, 中国民间信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圣俗一体的特征。英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说:“在中国人那里, 巩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学说或说是公理, 即似乎死人的灵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

触, 其密切的程度差不多就跟活人彼此的接触一样。”^[1]列维·布留尔说的“这样一种信仰”就是中国人的民间信仰。在民间信仰的视角下, 鬼活在人的空间, 鬼的喜怒哀乐同于人的喜怒哀乐。自魏晋至唐, 不少小说中就再现了死后魂灵返回家中、与家人继续朝夕相处的场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的缺乏宗教信仰, 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存在如此长久和广泛的鬼魂信仰。神路难期, 人毕竟有一死, 中国人对死后的世界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他们试着去探究它, 去描摹它, 归根结底折射出的是中国人对此岸世界的无比眷恋, 正因如此, 魏晋以来以鬼魅为主角的小说层出不穷。

从量的统计上看, 自魏晋六朝至唐以来, 鬼故事堪称奇观: 署名魏文帝曹丕的《列异传》今存佚文五十条, 取材鬼事的达十四条之多; 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当属魏晋六朝志怪的代表, 其中五分之一专属鬼故事; 东晋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凡一百六十条, 鬼故事占了三分之一; 刘义庆的《幽明录》存佚文二百六十五条, 鬼故事占了四分之一。这只是魏晋六朝小说创作水平较高的几个代表, 同时期的其他小说集同样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写鬼事。到了唐代, 魏晋以来的鬼魂信仰在民间风气炽烈的程度不减从前。从《太平广记》中“鬼”部足足占了40章节这一点足以看出唐代是如何弥漫在鬼魂气氛之中的。

鬼故事千奇百怪, 唐小说和前代有所不同的是, 说鬼其实为了写人, 写人情才是唐代鬼故事的主旨所

在。中国人对此岸世界留恋归根到底是对人情的不舍，鬼介入人的世界，是舍不得人间难了的亲情、爱情或是友情。唐代小说中鬼故事的人情化，一大原因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对人的世界的关注。古代中国儒家治天下，一切伦常道德指向的是正确的人与人关系，小说表现的也无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生哲学，鬼怪小说自不例外。鬼故事中不但按照人的世界构筑了鬼的世界，他们也将人情、人性赋予了鬼；中国艺术的审美抒情特质也决定了鬼故事的人情化。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小说发展成为很完美的传奇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情感。应世襄教授在《中国鬼神文化与小说》中谈及这一论题时更提出了鬼故事有比现实小说更优美抒情的地方：“因为它想反映一个与人间世同样的世界，想提供充满了人情的事迹与人物，往往比反映人世间琐事的现实小说更有优美的抒情。这种鬼怪小说可以说摒弃了恐怖，因为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2]

正因为注重现实、注重审美的特性，在唐代小说中，即使是宣扬佛教地狱观念的作品，刻划出来的鬼世界仍不免是人间的翻版。在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代表作品《冥报记》里，我们看到的鬼世界酷似人间。《冥报记·睦仁菑》篇中睦仁菑路遇鬼名曰成景，当睦仁菑问及冥间情景时，唐临借成景之口给我们描摹了一个与人间并无二致的冥界：“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色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六道之内，亦一如此耳。其得六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有数人，如君九品。入地狱者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3]正因为以“情”立意，不少反映鬼世界的唐小说作品起到了劝慰人情、感动人心的作用。《法苑珠林·孙稚》中孙稚死后家人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给家人描绘了这样一个鬼世界：“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无忧也，他但勤精进，福自随人矣。”^[4]可悠游乐处，可读书无作，这样的鬼世界简直已经是人间富贵公子的安乐窝了。既然鬼界一如人间，人间婚嫁在冥间也是需要的。《玄怪录·刘讽》中竟陵官吏刘讽夜宿夷陵空馆，听到庭院中众女子谈论与婚嫁相关的话题：“惟愿三姨寿等祁山，六姨姨与三姨婆等，刘姨夫得太山府乱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谥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啾嫁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望足矣。”^[4]鬼世界中，三姑六姨一个个在那里谈婚论嫁，这分明和人间别无

异处。

二、神灵信仰与唐小说中的“权”

如果说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是反映了唐代的人情文化，神灵信仰反映的则是唐代的权力文化。民间信仰中的神产生于人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当人类不能理解自然现象、难以驾驭自然的时候，通常幻想它们是有灵魂、有意志的存在，并逐渐在自己头脑里把它们虚幻反映成人格化的“神”。也就是说，神的一开始出现就是和凌驾人间、超越人间相关联的，进而演化成掌控人间、与君王类似的角色。最早关于神的解释也明确了这一定性，《国语·鲁语下》认为“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4]《说文解字》则云：“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6]

既然神拥有无所不能的能力和超越人间的权利，它对百姓生活就可以起到决断一切的作用。自魏晋至唐，小说中的神一方面犹如君王、大法官，主持和判断着人间的曲折是非，决定着凡人的生死命运包括官运姻缘等等；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又赋予了神呼风唤雨、变化多端的神异特征，当不可违抗的天灾人祸降临时，神会及时出现帮助百姓排忧解难。神灵在民间信仰中的最大权利是充当主持判断人间曲折是非的君王或是大法官。神灵因拥有呼风唤雨、变化多端的神力可以帮助百姓，其中又以山神崇拜为代表。山神决断人生死很早就已经存在，泰山治鬼最早出现在汉代。《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正义云：“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禘。”^[7]禘既然是祭地仪式，很容易被赋予了与死相关的涵义，禘地之所理当成为了鬼魂集中之地，而泰山神就是君临鬼界的王者。从汉代诗歌和魏晋小说中时而又可以见到泰山治鬼的明证，《乐府诗集·怨歌行》：“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8]到了唐代，泰山神成为鬼魂的统摄之神已是共识了，唐代的华山神还因为与玄宗的神秘关联曾一度跃居神灵的榜首。

同前代相比，虽然同样高居权位，唐小说中的神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质：一是同前代相比，唐代神灵在延续远古以来护佑人间和主宰人间的功能之外，其形象多了人性化的色彩。唐人有时将神灵看成与人相差无几，比如可以决人生死的泰山神，比如会惩恶扬善的雷神，他们也有弱点，他们也贪财好色，有时候收了好处还会断案不公等。唐代百姓对民间信仰中神灵的理解，从根本来讲是对神格的淡化，对人性的加

强。

唐小说中的神灵与前代相比的新特质之二是民间信仰神灵地位的逐渐下降。《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八有一则神的故事：

高宗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④

泰山神自汉魏以来，决断人间生死，形象威严，权力广大，到了这篇小说，泰山府君已沦入被华山道士呼来唤去的境地，“拜谒”于李播庭下，礼节甚“恭”地回答李播所问封禅之事。后又因泰山府君多看了唐宰相两眼，于是再将府君“呼”回。这样谦恭的泰山府君与汉魏以来那个决定一切的泰山神相比，其地位自然是今非昔比。虽然此文不无吹捧道教的味道，却也真实反映出泰山神至唐后地位下降的无奈命运。

三、精怪信仰和唐小说的幽默戏谑

精怪信仰同样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它与鬼魂信仰、神灵信仰并列，共同作用，对中国古代社会中民众心理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贾二强先生在《唐宋民间信仰》中将精怪定义为神鬼之外的自然或人为之物幻化的怪物。精怪因所依赖物种的不同而分为动物精怪、植物精怪、物品精怪等。

从自然崇拜演变而来的精怪信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还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魏晋小说中，精怪能成为小说主角情况还较为少见，大多以怪异的视角简单记录所见的怪异物象。到了唐代，精怪已经是民间的“宠儿”。唐代无物不能成怪，日用的桌子、凳子、枕头，屋后的农具、家什，庭院的李、桃、梅、柳，路边的牛车马车……在唐小说中都可以是一个个上场演出的角色。

唐代小说中对精怪的记述描写在保留部分魏晋时代精怪故事特点的基础上，同样呈现出人性化的色彩；同时，在人性化之外还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戏谑风格。谐趣与精怪关联起来首先要从谐辞谈起。谐辞由一种口头表达艺术进入书面最早是在战国的赋体里。战国

赋体的不少作品为达到对君主讽谏的效果，往往用类似俳优的口吻，俳优所用无非谐辞。汉代以后，谐辞逐渐丧失其讽谏君主的功能，进而演变成嘲谐或自嘲性的言说，其表达手段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急智的成分逐渐丧失，而虚拟与夸张的因素却得到了强化，有些作品开始在作品中用动物模拟人类行事从而产生滑稽可笑效果的尝试，这可以视作为后来精怪小说中富有谐趣风格的源头，如葛洪的《抱朴子》中就首先出现了一批具有精怪特点的动物。到了唐代小说中，不仅动物精怪谐趣登场，植物精怪、物品精怪都纷纷上演一个个富有戏谑特色的故事。举李德裕《玄怪录》中的一则故事：

……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纆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羨其自负……^④

雨霁初晴的明月之夜，四个衣冠楚楚、谈吐诙谐的精怪角色隆重登场，如果从楚楚的衣冠还不足以证明这是酸腐文人的话，紧跟其后的吟诗作赋给这几个角色酸腐斯文的模样再次加上了注脚，其幽默诙谐自不待言。等到故事结束之际，读者才发现这四个衣冠楚楚之辈不过是杵、灯、台、水桶、破铛，让人忍俊不禁。

精怪在唐小说中的地位不算高，尤其是到了故事结尾处，总免不了被人识破后的诛杀。民间信仰一大特点是功利性。人对死亡的畏惧连带了对鬼魂的畏惧，人对利益的追求同时意味着人对神的巴结甚至是贿赂，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谐趣”会和精怪故事发生关联。鬼在民间信仰故事中，有时令人畏惧，有时让人同情，但少有戏谑、诙谐的成分，这是人面对死亡、面对鬼魂的一种敬畏态度；神则更因为它是人们祈祷和求助的对象，因而也少有让人戏谑的可能。能给唐人提供一些喜剧色彩，只有精怪故事了。

精怪从民间信仰的殿堂来到了文人的趣味世界与精怪的地位息息相关。从民间信仰的发展史中可以发现，越是跟人有厉害关系的物件越有可能成为民间信仰的宠儿，生活物品在上古或许有过珍贵时候，甚至成为民间崇信的对象，到了唐朝，物品成为崇信对象几率大大降低，即使是成为作怪之元凶的时日也不会

太长，最终免不掉被毁的命运。人只有基于与精怪平等甚至是高于其上的态度，谐趣才可能发生。当物怪在小说中开始吟诗作赋的时候，虽然还可以将它归入民间信仰，毕竟，崇信的成分已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戏谑或是一种玩笑，是叙述者带着优越于其上的态度所作的一种文字游戏。所以，可以说，当唐人在神鬼世界里还留着毕恭毕敬的态度的时候，精怪已悄悄从民间信仰的世界进入了文人的文学世界，充当饭后的谈资和戏谑的对象了。

四、唐小说中民间信仰的新变

民间信仰自上古时代就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众的心理世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间信仰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唐代小说有关民间信仰的故事中也十分突出。出现新变的一大原因是佛道二教的影响。作为民众心灵世界慰藉的民间信仰在唐代民间街谈巷语中无处不在，不过，佛教和道教却是唐代的主流信仰，佛教在民间的兴盛和蓬勃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民间信仰的发展。为了传播和壮大本身力量的需要，民间信仰和佛、道二教架构起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在唐小说中也不时可见。

和前代相比，唐代的民间信仰从种类上、信众和范围上都有了大大增加，这是唐代民间信仰的一种新变。中唐张鷟《朝野僉载》中云：“无狐媚不成村。”^⑧李肇《国史补》中写到某作坊内供奉多尊神灵的事情：“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记，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好事者因目为流桂泉，后人乃立栋宇，为汉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髯须神。如此皆言有灵者多矣。”^⑨不可否认，正因为佛教在唐代发展的浩荡声势，好强自任的唐人有意无意也挖掘了不少独属于自己文化中的神灵。

民间信仰发生的第二个新变是和主流宗教二者之间有意无意的淆乱，不管是主流宗教在利用民间信仰亦或是相反，在唐小说常常会看到一些是佛教还是民间信仰一时难断定的模糊面目。以《广异记·韦璜》为例：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其嫂妹期曰：“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间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锅汤剑树否，答云：“我

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与诸女。”^⑩

小说中阎罗王和泰山府君两者指称不分，并同台登场，显得十分淆乱。《广异记·张瑶》中甚至还出现了阎王、司命、泰山共治鬼界的场面，这样的淆乱在唐小说中不在少数：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广袖楚官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其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某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⑪

狐精作怪乃民间信仰自家之事，到了为难时候，僧人出面，奉上丹药，解决了惑魅之事。

另外，唐代民间信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从类型上有新的拓展，新的神灵精怪在唐小说中不时出现。即使是已有的一些信仰内容，在唐代也发展出新鲜的特质，打上了鲜明的“唐记”特色。如守护神、行业神等新兴神灵影响逐渐增强。隋唐时期，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业门类增多，行业神也渐兴。李肇《唐国史补》中一则故事记录了当时处处是神灵的现实状况：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有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⑫

这则故事记录了当时各行各业为抬高自己行业的身价，纷纷将古代名人搬来做自己的行业神的事实。虽然故事有讽刺乱搬乱套神灵的本意，却为我们了解当时行业神大兴提供了一个良好注脚。另外，堂堂官方的后勤仓库里，酒神有杜康，茶神有陆鸿渐，连酱油神都封给了蔡伯喈，可见到处都是庇护唐人的神灵。从这则故事还可以看到唐代民间信仰发展的方向：一是多神化；二是平易化，这里的神灵与其说是保佑，不如说是一个摆设，一种文化装饰；三是知识化，像

那个做酱油神的蔡伯喈从哪里而来还有待可考, 不过估计其流通的范围是知识分子圈; 四是任意性, 一个驿吏可以想出一堆让刺史都摸不着头脑的神来, 可见民间信仰神灵个性化和任意化的一面。

参考文献:

- [1]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83.
[2] 应世襄. 中国鬼神文化与小说[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4): 56.

- [3] 何满子, 李时人. 全唐五代小说[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43.
[4]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534-2635
[5] 左丘明. 国语·鲁语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13.
[6] 许慎. 说文解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654.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355.
[8]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9]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33.

Folk belief in the Tang novels

HAN Yu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has conducted a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derived from 《太平广记》(A Series Collection of Tang Novels) and draw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belief in ghost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novels in that it represented the youth's love, which was unaccepted at that time, and thereby foretold the trend of history development; fairy tales in the Tang Dynasty shared the same narration with those of the Wei-Jin Dynasty, and consequently formed a new kind of novels, which is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Wei-Jin Dynasty; the belief in ghosts, serving as a spokesman for influence, took on a new evolution in the decline of the ghost influence upon folk belief as well as in the rising of humanistic motif which is the essential style and character of Tang novels.

Key Words: Tang novels; "ghost tales"; fairy tales; folk belief

[编辑: 汪晓]